



洛阳古墓与名人系列 唐代综述篇

市文史专家赵跟喜先生谈洛阳唐代墓葬

□记者 张广英

千年回望,让地下的历史鲜活

大唐300年风云变幻,多少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埋骨东都洛阳,以至北邙山上“旧墓人家归葬多,堆着黄金无买处”。这么多唐代墓葬,本系列中不可能一一写到,那么,它们的整体情况如何?我市文史专家、千唐志斋原馆长赵跟喜先生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,对唐墓作了总述。



赵跟喜先生(图片由本人提供)

穿越千年,让历史更加鲜活

记者:最近,我翻看您参与编纂的《千唐志斋藏志》和《全唐文补遗》,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:墓志的女性志主占了约一半,比史书中的女性所占比例高多了!

赵跟喜:大唐是一个包容、开放的王朝,女皇武则天执政,也使女性的社会地位空前提高,她们可以与男子一样在墓志中展示生平。墓志中,像“大周雍州司兵李氏妻王氏(姜嫄)”、“博陵崔公(藏之)夫人汶水县君太原王氏”等志主有很多。

在这些志主中,还有一位叫马凌虚的女道士。她是洛阳城中的绝色女子,23岁,风华正茂,“鲜肤秀质,环意蕙心,光彩可鉴,芬芳若兰”,并且才艺双佳,“有七盘长袖之能,三日遗音之妙,挥弦而鹤舞,吹竹而龙吟”。可是,安禄山的铁蹄踏碎了东都的繁华,她被卷入了安史之乱的漩涡,所在的开元观被改为圣武观,不幸很快来临。安禄山的部下独孤问俗将她掳去,“未盈一旬,不疾而歿”。同为安禄山幕僚的李史鱼为她写了墓志,也算一篇奇文。

记者:都说“读史可以明智”,今人通过墓葬回望唐代,您觉得会有哪些启迪?

赵跟喜:史书往往是纵向讲述一个王朝的人和事,讲求盖棺论定,只是一个骨架。还有很多人物史学家们没有将其记载下来,或者所述不清。墓志的出土,就使这些被时光的尘土掩埋的人,像一面铜镜又发出了光芒。这些酣睡的靈魂穿越千年,与今天的我们对话,让我们得以近距离地了解他们的生前事与身后名。

郑虔是唐代名士,他在屋里贮满柿叶,用来画画写字。后晋的刘昫把他写入了《唐书》:“玄宗爱其才,欲置左右,以不事书,更为置广文馆,以虔为博士。”这位广文馆博士从此天下闻名。他卒于台州官舍13年后,两个女儿将其遗骸迁回洛阳,葬于其夫人王氏在定鼎门外的莹地。

李邕是唐代书法家,因当过北海郡守而得名李北海。他性格豪放、不矜细行,竟在武则天主持的会议上拍案而起,声色俱厉地指斥政敌,连女皇也拿他没有办法。但是,他最终没有逃过李林甫的迫害,73岁时被杖杀于山东鄆城东30里的发配路上。后来,他的侄子李昂当了著作郎,为他撰文作铭,才出了一口怨气,“世人有不知公者,或以为外暴内侈,尚华好侠,曾不知泛爱之道,犹春风入林,不辨嘉木与众薪也”。

这样的古人还有很多,他们从北邙山走来,从万安山走来,从龙门西山走来,是洛阳文化深厚积淀的一部分。今天,我们仍能感受到他们的气息,这使我们能够更加接近历史,认真审视历史,然后用宽广的胸怀、宁静的目光、平和的心态看待问题,这就是古墓葬对我们的启迪。



北邙山、万安山、龙门西山,唐代三大丛葬地

记者:赵老师,我近来写唐墓时常常感到困惑:葬在洛阳的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那么多,地面遗存却非常少,能找到墓家的屈指可数,这是为什么?

赵跟喜:洛阳唐墓有一个特点,就是墓多陵少,很少有地面遗存,但是出土墓志很多。唐墓不像周、汉、魏时期的那样“墓冢高嵯峨”,这与当时的葬制有关。

唐代帝陵集中在长安,洛阳为东都。位高权重的功臣及宗室,死后都要陪葬帝陵;那些曾经声名显赫的朝廷重臣,一旦不慎跌落深渊,失去了陪葬资格,不能再回长安,就会选择葬在洛阳。这些人的墓冢本来规模就不大,加上盗挖或水土流失,年深日久多有损毁,地面上自然就什么也看不到了。

记者:常言说:“生在苏杭,葬在北邙。”

这句“广告词”是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?

赵跟喜:邙山北临黄河,地势开阔,土层深厚,宜于殡葬。东汉及北魏时期的王侯公卿多葬于此,唐代以来的名门望族、缙绅百姓也都认为邙山是风水宝地,即使死在遥远的江南或塞北,临终也要嘱托子孙,将自己还葬北邙。“生在苏杭,葬在北邙”的说法由此而来。这种说法唐时就有了,今人承袭的还是古人对北邙山的认识。

因为人们都想把北邙山作为“终极归宿”,唐时这里已是莹地连接,楸柏葱郁,“几无卧牛之地”。当然,这并不是说邙山上真的连一头牛也卧不下了,而是说墓地都已“有主”,后来者拿钱也买不到。

记者:洛阳唐墓的分布似乎不太集中,除了北邙山,其他地方也有不少吧?

赵跟喜:洛阳的唐墓丛葬地有三大块:一是北邙山,包括首阳山;二是万安

山;三是龙门西山。

北邙山“起自河口,西逾平阴”,东西绵延200里,“车辙广若长安路,蒿草少于松柏树”,自然环境很好。由于这里的墓葬太多,已经“饱和”,后来者只好另择地方。比如洛阳城南的万安山,就是唐代李、卢、郑、崔、裴、姚、王等名门望族的莹地,名相姚崇、张说等都葬在这里。由于位置相对较偏,直到20世纪50年代,万安山南麓的田间地头还立有不少石碑。

唐代的龙门西山,范围比现在要大得多,那里葬有不少皇亲国戚及世宦显贵。如唐高宗与萧淑妃的儿子李素节,死在洛阳城南的龙门驿,其九个儿子全部“窆于河南府龙门乡之平原”,就是现在的龙门西山。你前几天去访李德裕平泉庄,一路经过的张沟村、毕沟村都是唐代丛葬地。因为龙门西山寺院很多,附近还葬有许多僧尼,其中有一些来自异域。

唐人墓志是一部“石刻唐书”,可以证史、纠史、补史

记者:您刚才说,唐墓的一个特点是墓志多,这些墓志是怎么保留下来的?

赵跟喜:墓志之作,意在传世。北魏迁都洛阳后,王公贵族都葬在洛阳,为了便于后人辨识莹地,他们多在青石上刻墓志铭,伴自己长眠地下。

到唐代,刻志之风盛行,墓志成了一种时尚。无论男女老幼、高官平民,死后都可以刻一方墓志,标明自己的世系爵里、生平事迹、配偶子嗣、卒时葬地等,相当于今人的传记。不过,这种石刻传记比写在纸帛上的传记更有生命力,它久藏地下也不会损坏,随着陵谷变迁,山川更易,还会重见天日,让人借此了解历史。

当然,墓志能够保留下来,还得益于

志石的笨重。唐人随葬品中多金银器物,以致盗墓成风。不过,盗墓者的目标主要是金银珠宝、三彩冥物等,对笨重的志石则很少问津。这些志石出土后往往流落民间,老百姓用来捶布洗衣、修筑沟渠或者砌墙填基等。后来,有识之士从民间征集,许多墓志才得以保存下来,让更多的人有机会看到它们的真容。

记者:墓志主要有哪些作用?

赵跟喜:洛阳历代出土的墓志有上万方,其中唐人墓志占大多数。从李渊、李世民父子的武德、贞观起,历开元、天宝,到晚唐的天复、天祐,包括武则天的改元、安禄山的僭号,历经300载,年号所缺无几。这些志主的身份各异,既有相国太尉、刺史太守,也有雄据一方的藩镇大吏,有官卑职微的尉丞参军,也有处士名流,甚至寺观僧道、宫娥才女。别看一些志主名不见经传,他们的墓志中对唐代一些重大事件也多涉及。可以说,古人在不经意间,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刻在石头上的“唐书”。

《千唐志斋藏志》中,有武则天大周时期墓志148方,其中程思义等人的墓志中

提到武则天重用酷吏,董怀义、白知礼等人的墓志记述了“后武则天时代”的一系列宫廷政变,还有一些墓志中讲到安史之乱……可以这样说,唐代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、外交、民俗等方面,墓志中都有涉及。

同时,作为当事人一生的总结,其中所记事件都是亲历,且由同时代人所作,墓志在证史、纠史、补史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,很多时候,它比史书更为可靠。

一方方墓志,还是打开一个个千古之谜大门的钥匙。比如李素节的九个儿子被武则天的酷吏诛杀于舒州,到底葬在何处,史书没有明确记载。后来,他第九子的墓志在龙门广化寺西北出土,人们才弄清楚,原来这九子之墓就在龙门西山上。

安史之乱爆发后,安禄山打进洛阳,国史散失。关于唐玄宗天宝年间这段历史,新、旧《唐书》要么语焉不详,要么张冠李戴,要么时间移位,“吏部”写成“工部”之类的谬误时常出现,很令后来的史官头疼。而那段时间的墓志,则是检验史书的一把尺子。

